

中國傳記書寫的創舉

陳世驥 著
高文萱 譯
陳國球 校訂

過去數十年間，中國的文藝復興（按：指中國新文學運動，是胡適向西方國家介紹新文學運動時的用語。）創造出許多輝煌的成果。以白話文作為文學媒介普遍為一整個世代的作者所接受，加之對現代西方思想的吸納，以及對於所有傳統價值的重新評估，這一切都為文學創作帶來許多根本性的重大改變。在這段時間裡，新興的理論受到廣泛的研究與實踐，全新的文學形式與文類蓬勃發展，傑出的詩歌、小說和散文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讓這個時期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傳記這項古老的文類卻似乎未曾受到新興文學運動的影響。也正是因為如此，本文將檢視的這部傑作才更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稱這部著作為全新的試驗或許仍嫌過於保守。若要評估這部著作在現代中國傳記文學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有必要檢視這股堅守近兩千年的傳統，簡短回顧中國傳記文學的早期發展、其後興盛與晚近的演變，同時勾勒出本文所討論的這部現代著作所處的特定環境。

對於我們這些現代人來說，傳記的書寫理所當然該聚焦在對個人生平與事業發展的詳細描述；所有的政治、道德或宗教關注則為次要。然而，綜觀世界文學史的發展，我們會發現長久以來，無論是在中國或歐洲，實

* 本文發表於1953年11月《遠東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第13卷第1期，為陳世驥對朱東潤：《張居正大傳》（*Biography of Chang Chu-Cheng*）（上海：開明書店，1944年初版，1947年第二版）所作的書評。

** 陳世驥撰寫此文時為加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高文萱畢業於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倫敦大學學院（UCL）藝術史博士班，現職為自由翻譯家。

**** 陳國球現職為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暨人文學院院長。

際情況都正好相反。在個人能夠成為文學所歌頌的主題之前，可說是歷經長期的艱難，其間的千辛萬苦實不亞於奴隸重獲自由的過程。

用來指稱傳記的中文詞彙「傳」，表明這個文類早期的附屬角色。「傳」字之意在英文中大略同於「transmission」（傳述），此外，若按照傳字的古老用法，也被譯為「commentaries」（評註），如《公羊傳》的翻譯即為「Kung-Yang's commentaries」（公羊評註）。「exegesis」（注釋）一詞雖然可能有些先聲奪人，但就「傳」一詞側重「解釋」之意並且就詞源上來說帶有「指引」意味時，則這個翻譯或許最為適切，而若「傳」基本上是指「傳述」或「指示」，則應譯為「commentary」（評註）。因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古代「傳」普遍作為一種手段，藉此達到一個更為崇高的目標——藉著解釋、說明並闡發經籍，以傳揚宣導當中偉大的思想與信念。

即便文學史學者在研究上的好古取向甚至帶領他們追溯傳記的源起直至《晏子春秋》，¹主張這部內容實際上包羅萬象的雜論為傳記文學中首開先河之作，但一般仍同意在西元前二世紀末的十年間由司馬遷所作的《史記》才是真正開啟傳記文學體例並創建這個文類名稱的第一部著作。但我們也知道司馬遷以「傳」指稱其人物傳記乃是固持著這個詞彙早前的意涵，即他所描寫的人物生平僅僅只是用以說明某些偉大事件與時代理型的例證；他的「列傳」也因此屈居「本紀」之下，就某個程度來說道理近似於《公羊傳》之於《春秋》。因此，雖然司馬遷有許多絕妙的神來之筆，但整體來說，這些傳記的描寫仍是奇怪的混合與漫筆。出於某些不相干的考量，毫無關係的人們被歸類在同一傳中，而個人的事業與人格特質必須透過拾綴拼湊散落在不同環節中的條目才能得見全貌。《史記》中所描寫的人物看來多半有其失衡與偏重之處，這部著作真正關注的重點不在人物，而是在人物之上的一個更大的框架，也就是數千年歷史發展的整體。

截至目前為止，《史記》為所有後世的斷代史奠定了書寫模式，而歷經各朝各代，每部史書列傳中的傳記，其從屬地位與不完整的本質始終不變。而諸如《列仙》、《列士》，或是西元一世紀劉向所編纂之《列女傳》等著作，雖然就形式而言並不附屬於任何經典或歷史著作，也常被視為「傳記」，但實際上只是記錄個人生平某些特定面向的簡短筭記，內容往往虛實交織，並且符合早期對於「傳」的嚴格定義，意即「傳」必須用於說明並解釋某

¹ 例如《四庫全書總目》的修編者。見《四庫全書總目》第57卷中傳記部分的卷首語。

些道德或宗教思想。這些作品中的絕大部分的確比較應該被稱之為道德小說或超自然小說的前身。

在漢光武年間(25-27),「傳」的書寫發展出現了的一個重大觀點轉變,其關懷不繫於歷史或經典,而在於個人生平的相對獨立的記載。書寫的動機無疑仍是道德的與政治的。漢光武帝自己是一位面臨著許多改革問題的知識份子,因此制訂政策以從知識份子圈中延攬新人才成為他的當務之急;藉著激發並且凝聚在地人士共同的地方意識,特別是各郡縣中足以擔當政府公職或接受政府表揚能人志士,光武帝希望能以此拓展政府晉用人才的基礎;同時為其政治中興創造出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道德氛圍,讓一個被篡奪之後消沉頹喪的王朝得以重振聲威。這些現象為傳記書寫帶來一個全新的發展。這個發展或許可以視為從歷史主義過渡到地方主義的轉型;而書寫的關注也從古代或傳說人物轉移至當代或近代人物。這點或許也是在智性上致力於對抗極端文化好古主義所產生的結果,這種好古主義乃是篡奪了西漢的王莽所致力提倡。因此,秉持著這股精神書寫的傳記,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多以特定郡縣的耆舊傳、先賢或後賢傳等標題為名。藉著這些作品的創作,傳記雖仍採取一種速寫式的書寫形式,卻已脫離歷史著作與神話紀錄的藩籬。個人作為書寫主題,整體而言至少獲得更多的關注,地位也隨之提高。地方主義讓傳記得以深入描寫個人生平與事業,提供一幅更為親切而平易近人的景象。在此,我們必須指出地方主義保存了一個悠久的傳統,為之後的「方志」提供在史地資訊之外豐富的傳記史料。

在漢代之後,中國傳記有了歷時甚久的長足發展。在普遍流行於魏晉南北朝時代社會、哲學與文學思想等層面的新興個人主義達到頂峰之際,傳記文學的書寫無論是在品質或數量上都大為提升。個人的個體性,而非類型,特別獲得關注與強調。一時之間獨特的人物取代傳統美德受到推崇與讚揚。雖然這些傳記無論就性質或目的而言皆已改變,某些作品仍以「傳」為名,但也有許多其他作品或改採其他名稱,如「敘」、「言行」、「家傳」、「行狀」及「本事」等。最為普遍採用的名稱是我認為首創於這個時期的詞彙「別傳」。我們必須特別指出,這段時間所留下的作品中,絕大多數以「別傳」為名。這個詞彙的涵義歷來多有爭論。傳統的解釋認為「別」字既然表「其他」之意,則當某人已在斷代史書中被立傳,則另一部傳記就應該稱為「別傳」,以區別出較不正統,甚至有時可能可信度較低的一部相似作品。這個解釋並不正確。事實上在後漢時期,有為數眾多的「別傳」

是寫在個別正史編修之前。此外這些作品中也幾乎不見任何暗示作者意識到存在著其他同類著作的蛛絲馬跡，或者是作者為作品並非正史而表達歉意。事實上，我們反而有時會看到正史的編修者直接逐字採用既有的「別傳」段落。因此，我認為「別傳」一詞的使用，正是要特別凸顯出傳記自魏晉時期起就已受到肯定的獨立價值，而在之後的前唐時期，傳記更是進一步蓬勃發展。「別」字在此乃側重其「分別」或「區別」之意，除了以此暗示個人傳記與正史那凌駕一切的龐大架構之間的區隔，也希望能夠傳達傳記自身獨特的價值。²

因此，「別傳」之名的使用不僅意味著對於歷史文學傳統的反抗，同時也代表著一份前所未有的覺察，認識到這個以人類作為關注主體的文類的重要性。從這些簡短而生動的「別傳」中，原本應開始發展出接近現代定義的成熟傳記作品。然而這個發展卻被長達近一千三百年的各種內憂外患所阻礙。

傳記的衰退始於初唐。我們必須承認，印度佛教文學以其對於神蹟奇事與朝聖之旅鉅細靡遺而充滿戲劇感的敘述，對於前唐時期的傳記書寫的語氣及技巧起了很大的影響。成書於唐高宗年間（650-683）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確實是一部偉大的傑作。從那時起，除了較早期的《高僧傳》之外，在數百年年間出現一系列佛教高僧的傳記，形成一股佛教傳記文學潮流。然而單獨描寫一般人生平的傳記作品卻明顯減少。這個現象顯然是因為唐代政府透過史館，而在主導修編前朝歷史（傳統上稱為正史，意即正統的歷史）上的權力前所未有地增強與擴張之故。藉由設置負責修編歷史的官署，撰寫任何值得被留下紀錄的個人生平成了政府的獨佔事業。私人對於家族成員或其他對象的傳記書寫工作，只能作為提供給史館的資料，不再被稱為「傳」。如今，「傳」這個名稱處於一種尷尬而諷刺的分裂狀態。一方面既用於稱呼官方在「正史」中所推崇的傳記，自負具備一切本真性與權威性，即便它們仍不得不屈從於自司馬遷以降的史書傳統視傳記為輔助的從屬地位。另一方面，猶如是為了挑釁或嘲弄一般，文學想像則使用「傳」字命名許多虛構小說，這類帶有迷信與浪漫色彩的作品於唐代相當

² 雖然現代對於「別」字的解讀與意義有所分歧，但毫無疑問，初唐時期的作者在使用這個字彙時，的確特意強調「別」作為形容詞的強烈特殊意涵。對「別集」的定義請參見《隋書經籍志》（同文版），第35卷，第20b頁。

盛行。少數古老詞彙也在一些狀況中被採用，如「內傳」及相當淺白的對照「外傳」，在此「內」意指「隱密」，通常用於描述道教神仙生平的著作上；「外傳」的「外」字則隱含著偶然之意，多使用在富有浪漫精神的神話傳說。

因此，一方是歷史書寫的威權主義，另一邊是文學的千變萬化，在雙方夾擊進逼之下，中國作為傳記文學的「傳」就此萎縮衰敗。西元十七世紀間，顧炎武甚至進一步聲稱「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考。」他更斷言個人只能立「碑」、著「誌」與「狀」而無傳。³針對這些作品所設的限制相當明確。它們通常是由家族成員或友人為了讚揚追思亡者而作，而除了少數例外之外，這類作品大多充滿各種陳腐而又形式化的歌功頌德之言。

這個狀況持續發展了數世紀，並且形成了現代傳記作家必須頑強對抗的一個強大傳統。從本世紀之初開始，現代中國文學就嘗試在各種不同的面向上開創新局，並且在不同時間點發展出不同的文類。終於，朱東潤教授的大作問世了，這本書可以說是截至目前為止最優秀的傳記著作。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一如我們上述的討論，乃是出於一種反抗古老傳統的新興文化自覺，以及面對西方世界的文化衝擊所帶來的結果。一直等到推翻古老舊習的激烈反抗時期結束，同時一方面吸收、消化並且敏銳地比較研究各種西方形式及觀念，才終於出現成功的果實。朱東潤以偉大的明代政治家作為主角的這部作品，以其特殊的性質與特徵，為體現當代中國文學發展臻於成熟的最佳例證。他的成功關鍵在於他對舊史料的巧妙運用、對於古老文學與道德價值客觀但又深入的知識與了解、對於世界傳記文學的廣泛涉獵，以及擅用最適切之語體以配合其描寫對象。

朱東潤自一九三〇年代起於武漢大學擔任中國文學教授，其著作十分豐富，範圍涵蓋文學歷史與批評，其作品的特色在於理解與探究個人的強烈興趣，即便是在討論極為艱澀難懂的概念時也不改其色。在他其中一部較為知名的著作《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如作者在序言中坦承，他刻意將個人安排在書中最为顯著的位置——事實上明顯到在一開始的幾個章節之後，全書從陸機（261-303）至陳廷焯（1853-1892）的整整七十個章節，每章都是以個人或數人作為章節標題，而非時期或學派。此書或許並不令他感到完全滿意，因為他以其向來謙遜的個人特質為此書致歉。然而，孟

³ 見《日知錄》，第16卷，第15條。

子的理想「知其人」大概就是朱東潤的目標。而這點自然讓他成為最有資格為一位歷史人物作傳的作者，這部作品也的確為同類的現代中國傳記文學樹立了一個典範。

在著手準備這部傳記之前，朱東潤首先對傳記文學技巧與其傳統地位作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同他在序文中所言，他以一系列文章發表這些研究的成果，諸如〈中國傳敘文學之進展〉、〈傳敘文學之前途〉、〈傳敘文學與人格〉，以及《八代傳敘文學述論》等。這些文章可能都於戰時出版，因此我至今尚無緣得見。但從他的自序中，我們可確知他的確對於傳統的中國傳記書寫作了徹底的批判性研究與檢視，並且接著在我們接下來即將討論的這部作品中進一步提升並改革這項傳統。因此，這部作品的特殊標題《張居正大傳》，藉著顯示作者身為一位保守但又有清晰目標的進步主義者所抱持的態度。他為這個新奇的書名而道歉，請讀者不要感到詫異。他說既然「傳」這個原本用於經注的名稱早已被過去的歷史學者用於命名他們以傳記形式書寫的歷史評論（我想我們可以稱呼這些作品為「子傳記」〔sub-biography〕），況且在這些經注中，有許多都以「大傳」為名，因此，他只是再度援用另一個古代用法罷了。然而，既然「大」在此帶有「偉大」或「宏大」之意，朱東潤因為謙遜而沒有說出口的，是他事實上希望這部以「大傳」為名所寫作的傳記，無論在廣度或境界上都能超越所有的傳統傳記，為中國傳記文學達到一個更高的文學成就。這個獨特的名稱也讓我們想起後漢時代反傳統主義的傳記作家所發明的「別傳」，只是我們這位現代創新者也許更為雄心勃勃，也因此更充滿自覺。他完成的作品確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大傳」或可翻譯為「magna vita」（偉大的生平）。而朱教授也的確創作了一部相當偉大而傑出的作品。

就像印度文學對於後漢中國傳記的發展影響甚為深遠一般，這個領域的現代西方理論與實踐也同樣提供給中國許多的觀念與挑戰。從鮑斯威爾（William Boswell）的《約翰遜博士傳》（*Johnson*）乃至斯特拉哲（Lytton Strachey）的《維多利亞女王傳》（*Queen Victoria*）與莫洛亞（Andre Maurois）的《狄士萊里傳》（*La Vie de Disraeli*），朱教授深入探究了各式各樣的作品，同時，他對於傳記的現代社會心理學理論也並不陌生。雖然這些的確都有助於指引並且拓展他對於傳記文學的觀點，然而他從未曾制式模仿或者機械性地使用任何社會學或心理學的公式。他對於西方著作的研究讓他相當了解自身所使用史料的不同性質，對於一位中國傳記作家在處理歷史人物

時所肩負的獨特使命也深具自覺。他似乎認為他的材料更加原始而未經處理，所擔負的責任則是加倍。他相當推崇史特拉屈與莫洛亞的著作，但也承認這些作品是在十九世紀格蘭斯頓（Gladstone）與狄士萊里的大量傳記所形成的扎實主幹與堅實根基之上所生長出的花朵，精緻而優美。他對於缺乏如此根基的中國傳記所抱持的理想，是一方面要包含豐富並且組織良好的資訊，以古老歐洲客觀而冷靜的方式進行紀錄，另方面具備現代傳記的尖銳觀點與生動活潑的書寫，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必要時，為了呈現真實的內容，他會犧牲形式的優美。

作為實驗這個理想的作品，他可以說是選對了主題。不過在數十年前，梁啟超聲稱張居正（1525-1582）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六位政治家之一。張居正曾是歷史上最受爭議的人物。他在明朝最關鍵的時期出任內閣首輔所握有的大權，他為了成功推動改革所採行的嚴厲手段，為應付詭譎兇險的官場與危殆不安的政治形式所策劃的謀略，以及他個性上的某些悲劇性的缺憾，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不同的評論者不約而同想要將他套入各種相互矛盾的刻版模式之中；他要不是個深諳如何煽動人心的謀略家，如一般觀點下的曹操或桓溫，一個意圖篡位者；或者是如周公或諸葛亮一樣是忠心愛國一心護主的典範。這個問題因為張居正死後一年所發生的戲劇性事件而更是難解；在張居正死後，曾對輔佐他的年長政治家十分信任而又言聽計從的年輕皇帝神宗，突然削盡了張居正的所有官職，將他的家產全部充公，他的兒子也被逼自殺。張居正一手主導施行的改革運動被惡意摧毀。我們可以想像，在神宗接下來的在位期間，人們幾乎不敢提到張居正的名字，除非是為了討皇帝的歡心毀謗他，或是耳語種種臆測傳言加以批評或合理化皇帝那不同尋常的強烈憤怒。在這樣的狀況下，謠言很容易被後人當作事實，而懷疑也漸漸成為不可動搖的成見。

因此，雖不乏張居正生平與所處時代的相關史料，但所有的這些史料必須加以謹慎使用。朱東潤在對日戰爭隨大學流亡的期間寫下這部作品。當時的書籍相當短缺，舉例來說，他就無法取得《明實錄》，只能間接從其他來源的引用中閱讀片段。他的閱讀資料包括諸如《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史稿》及《明會典》等權威古籍；並在艱難的情況下取得各種雜項文獻。透過曠時費力的考察，朱東潤從這些材料中篩選出與他的主題相關的史料，梳理並且組織這些資料，重建出一幅生動而又輝煌的畫面。他對於這些史料的真實性始終保持一份警覺心，並且選擇由張居正兒子所編

集，多達四十六卷的書信、備忘錄、文章與詩作為主要史料。透過這些資料，張居正的人格特質躍然紙上，顯示出他的性情氣質，並且藉著深入分析當時情勢與相關人物的資訊，釐清事實並且匡正道聽塗說的謠言。這項任務或許比一般以為的來得更加艱難。雖然書信和備忘錄應該是按年份排序，但有許多文件並未按序編排，也未註明確切時間。再者，書信和文章的內容中包含了老年時期對過往的回憶，而回憶可能有錯誤或出入，畢竟後見之明或自我的合理化都可能會扭曲或篡改當時的動機或事件。同樣的，這類文件中的個人主觀判斷與偏私都必須被除去。只有透過全面而深入地閱讀、孜孜不倦的考察與鑑別，同時具備深刻的洞察力，才能夠安全地使用這些史料。朱東潤處理了上述所有的問題，並且竭盡所能地下足功夫，才能夠掌握這些經過驗證的資訊。

朱東潤這本著作聚焦於兩個議題。首先是文學與心理的關注，並提出超越傳統框架的道德判斷。像張居正這樣一個身處動亂時代的複雜人物，我們不能採取非黑即白的觀點，將之簡單歸類為充滿野心的煽動者或是誠實可靠的智者。因此，我們會看到他的生平雖然如此成功而志得意滿，但在最後總結時只能被視為一場極大的悲劇，令人感嘆但也令人敬畏。在古典悲劇中，英雄所不能掌控的情境往往決定了他的命運，而英雄頑強的意志陷入與道德矛盾之間的衝突。在張居正的生平際遇之下，如同朱東潤的新傳記所顯示，事實上深藏著同樣的情境。遺傳與童年經驗型塑了張居正的性格，並且預示了他未來的事業。之後，他的個人意志與決定，則讓他在充滿張力與衝突的明代社會中，堅持違抗這個社會所訂定的傳統倫理規範。

張居正的家族四代以來都屬於社會的中下階層，但仍不忘他們的先祖曾在太祖麾下於開國有功的光榮過往。張居正的曾祖父患有口吃但樂善好施。一如那些有語言障礙的人士，他總認為他虧欠這個世界，而他一心助人的熱誠表現在他不知節制的自我犧牲舉動。他總是說：「願以自身作草蓆，使人睡臥其上。」這位年老的家長相當長壽，並且以他超乎尋常的熱誠與無私讓張居正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對於年幼的張居正的影響，展現在一封張居正寫於1573年的書信之中，這一年他成為內閣首輔，在平步青雲的政治生涯中回憶著他二十八歲時的想法：「二十年前曾有一宏願，願以自身為蓆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呼！」

他的曾祖父抱有希望能恢復家族榮耀的遠大志向，但他的父祖卻都是任性自為、秉性浪漫的人，讓他的曾祖相當失望。張居正似乎並不真心尊敬他的父祖，然而如同朱東潤所指，我們相信張居正仍是繼承了他們特殊的性情氣質，以及膽敢反抗傳統習俗的固執倔強。

另一個童年時期的人際關係亦有份於形塑張居正性格並且激發其野心。張居正所居之城為年輕遼王的封地，兩人年齡相仿。作為一位神童，張居正經常受遼王之母的邀請至府邸拜訪，遼王母毛妃經常以張居正這位出身平凡但卻是才德兼備的神童加以勸誡遼王，她曾相當嚴肅訓曰：「你這樣不上進，終有一天給居正牽著鼻子走呀！」也因此，兩個男孩之間的暗地裡滋長了仇恨的心結。張居正自負他比遼王優秀，也決定在長成之後要證明他要比王公貴族更為傑出。之後在他於明朝宮中實際掌握攝政權力時，他對待年輕的皇帝所顯示出的那種父親權威與嚴厲的態度，以及他毫不避諱地將自身相比於周公這位號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輔弼之臣，但實際上是一個被高度理想化的古老朝代的實質掌權者，如此種種事蹟，張居正早期的童年經驗或許可以提供部分的解釋。因此，雖然張居正為了社稷的福祉將自己奉獻給國家，但在「忠心為國」上，張居正則又太過，僭越了中國傳統上對於合宜舉止的規範。在年輕的神宗皇帝的內心中，恐懼與仇恨暗暗地滋長，為後來的災禍埋下了種子，這場災難最終以張居正身後所受的抄家削爵之辱以及對於他為國家所建立的一切毫不留情的摧毀畫下了句點。

另一場悲劇性的插曲也為張居正帶來許多敵人，甚至包括那些原本尊敬他的人。在他父親死後，他渴望保有作為當世最成功的首輔所握有的權力，然而這點讓他陷入與當時社會傳統價值觀之間的尖銳對立與衝突。在一些故作姿態之後，他選擇接受年輕皇帝的慰留，不守「三年孝期」，甚至不回鄉奔喪，而是繼續出仕朝廷。當「盡孝」與「忠君」出現矛盾時，要毅然決然地在道德兩難中作出決斷需要勇敢的決心，然而結果往往是悲劇收場。在張居正作出這個決定之時，朝中到處可聞見嚴厲的諫言與激烈的抗議。當皇帝下令讓最直言不諱的諫言者受廷仗之刑，而有些受刑者被仗斃時，張居正默許皇帝的命令。這點讓他遭受到極為嚴厲的批評與中傷。

作者再次將此上溯至一個早年的事件，幫助我們了解張居正無情的決定。西元 1554 年，張居正因病暫時從官場上退下，回家鄉簡陋的老宅養病了三年。他之前才初嚐政治的滋味。雖然有些厭惡，但不由自主感受更為

深刻的卻是挑戰。在家鄉，年輕的遼王提醒著他必須努力成為什麼樣的人，又必須勝過那種階級的人。在長時間的沉思與一些可能的不快經驗之後，他帶著對自己堅定的信心離開了家。他就要脫離平凡的出身。他會了解到他的野心不在他簡陋的家園，不在孝親的光環，而在於統掌整個國家的權力，甚至連高傲的皇家都要在他的權力之下。他將會以他曾祖父的無私，獻身於追求人民的利益與遠大志向所帶來的光榮。這當中隱含著一種悲劇面向。也許他下意識感受到這點。在他離家之前寫下的〈割股行〉一詩充滿了深沉的悲哀，表達出他的感傷。這首詩以一種革命式的處理手法講述一個古老的主題：一個人割下身上的肉獻給他的父母。但事實上，在此張居正以詩表明，如果一個人定要為了道德原則或理想傷害自己，那就讓君主成為這個獻身的理由。「我願移此心。」讓對父母的孝心轉而成為對君主的忠心！他的決心如此無情，因為他藐視所謂「中道」的傳統規範，如他在詩中所言：

吁嗟殘形，
似非「中道」，
苦心烈行亦足憐。

作為一位悲劇英雄，張居正的確值得我們惋惜。然而，這點卻花費了我們將近四百年的時間，才出現一位現代傳記作家發現張居正的如此特質，並且讓所有傳統的批評相形之下顯得淺薄。

朱東潤的第一個議題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了其傳記主人翁的道德生命，而第二個議題，則將張居正表現為一位成功的政治改革者，反抗權貴階級的既得利益。這篇議題的寫作方向及發展，與傳統評論的動機完全背道而馳。它解釋了在近幾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上，當這些既得利益仍舊存在時，即使是毫無根據的謠言毀謗，也能為眾人所接受，為此，我們可能會期待傳記作者——反擊那些針對他的英雄所提出的個人攻擊，在書裡來一場慷慨激昂的辯論；或是改採冰冷客觀的社會學分析，說明階級的掙扎。然而，朱東潤所採取的方式似乎較為中庸，並以細緻的書寫手法達到他的目的。他避免將張居正置於一個必須為自身辯護的位置上。張居正的成就歷載於冊，所有的人都可得見。即使是最冷漠無情的傳統傳記作家也不得不承認這些成就。朱東潤以他生動的敘述手法賦予這些文字一種個人的、情感的內涵，為這些公開的史料注入生命，呈現出一位行止歷歷在目的政

治家。他同時也根據脈絡從張居正個人文件、書信、備忘錄、文章與詩作中引用許多相關段落。在所有與政治改革、國家改造與國防相關的重大決定相關的書寫上，朱東潤更放筆描繪一位偉大的人物那激昂的心智與沸騰的血脈。

在這樣偉大的境界浮現之處，所有最惡劣的人身攻擊都顯得可悲，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朱東潤隨即展開他的申論。他呈現出採取嚴峻改革手段的必要性。藉由檢視下方列出的這些驚人數字，我們可以看出對皇室特權加以限制與縮限，以及對富有地主課加重稅等政策的必須：在西元 1561 年的一場調查顯示出全國田賦輸京米四百萬石，皇室子弟理論上應領八百五十三萬石。換句話說，即使把所有四百萬石都支付給皇親們，也不到應支付額的一半，這部分必須以其他方式加以補足，或成為政府的負債。而在 1573 年，張居正在一封信中提及，某些大地主占有的田地達七百萬畝，約一百零六萬六千零六英畝！一位改革家需要在對目標堅定不移的同時，也密切注意這群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地主集團。為了確保他所制定的法律能有效實施，他頒布了「考成法」。雖然此法是針對特權階級而制定，但也震撼了整個死氣沉沉的官僚階級，擺脫僵化的慣性。

張居正的成功不能不說帶有奇蹟的成分在其中，特別是在明代，「大學士」的地位並不高於六部長官。然而張居正藉著耐心、勤勉的工作、通權達變的機敏謀略，以及策略性的政治同盟而獲得成功。也許有人會批評他的手段過於嚴苛，他的態度過於強硬，或者他的策略太過狡猾。但是無論是從動機或結果來看，如同朱東潤明確指出，上述這些觀點都不足以成為譴責張居的正當理由。即使是對張居正最嚴厲的批評者，也沒人膽敢宣稱他所尋求的是自身的財富、特權或甚至更高的官職，事實上這些常被強加在張居正的身上，但卻為他所拒。他的確有一股追求成功與絕對權力的決心，但這卻最終被證實是個悲劇缺憾。他值得被同情，而非譴責。

也許對於張居正的毀謗性言論之所以會流傳數個世代的主要理由，是因為他的改革也同樣針對他所處的那個階級，也就是知識份子。兩項基於事實但卻受到主觀詮釋的罪名，便足以讓儒家知識份子在幾百年來持續感到義憤填膺。以歷史紀錄的話來說，這兩項罪名分別是「毀壞地方書院講學」以及「裁減各州縣生員學額」。所謂「毀壞」其實是要廢除那些在王陽明（1472-1528）提倡的教育哲學極端發展之後出現的機構，這類機構培養出一群自命不凡而又滿口仁義道德的偽君子，整日遊談而毫無行動力。而

「州縣生員」甚至在張居正之前的時代就已經被稱為「學霸」，他們隨著人數漸增在地方成群結黨，仰賴政府過活卻整天無所事事，閃避差役、介入法律判決而造成地方官與人民的困擾。他所採取的措施可能有其正當性，但卻也讓他受到自身階級成員的仇視。

張居正巨大的權力與成功為後來的君主所忌憚。為迎合上意，官修史家也不太甘心認可他的成就；他們甚至對張居正毫無篡位意圖的忠心耿耿而感到可惜，否則他們就更可大肆猛烈抨擊。他們樂於知道任何對張居正的毀謗與中傷，無論不可信。在張居正身後受辱的三十六年間，如同我們於前文所提及，所有認同張居正的言論在皇帝聽來都十分刺耳。這段時間長得足以製造出許多毀謗中傷之言。這大多是人身攻擊，以至於在多年之後當我們想為張居正的人品挽回聲譽時，很難提出反證駁斥這些中傷與毀謗。舉例來說，與張居正同時代的其中一位評論者，著名的文學家王世貞（1526-1590）在其著作《首輔傳》中便記載了一些這類言論。在他論及張居正的章節中，他寫下當他談及與友人成仙的女兒的精靈溝通時，張居正對他的責備。張居正斥之為無稽之談，威脅要處罰王世貞。王世貞或許並非著名情慾文學《金瓶梅》真正的作者，但在這些討論張居正的章節中，每當涉及一些邪淫之事，王世貞總顯得特別樂在其中。他堅稱張居正沉溺於肉體的放蕩享樂，並且服用了過多春藥。「若男人的公眾生活難以指責，就查看他的臥房。」然而，直到張居正過世之前大多數的時間，王世貞都退居在遠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如同一位面對瘋狂審判的好律師，朱教授明智地選擇忽略這類的毀謗言論，而是藉著運用經過仔細驗證為真的史料，專心為張居正的生平勾勒出真實可信的樣貌。他只有在可以提出確切的書面證據加以駁斥這些毀謗之言（例如關於張居正與兩位太監的關係），或者察覺到這些言論乃是經過扭曲，並且在澄清事實之後有助於理解張居正的生平之時，才會略加提及這類言論。

另外則是形式與風格的問題。為了挑戰並修正成見，傳記中必得針對資料及文本提出論證，然而太多這類討論會讓整本書讀來像是未經處理過的研究文件，而不是一本可讀性高的傳記作品。朱東潤在這兩者間取得了極佳的平衡。若與重大事件相關的不同文本彼此出現矛盾，一般說來他會引用所有重要的文獻，將這些文獻組織成流暢而活潑的敘述，論證出深具說服力的陳述。他採用一種親切、清晰而又自然流暢的白話文書寫，當中不時插入長篇幅的引文，這些引文多擷取自張居正自身的古典散文，其文

擲地有聲且鏗鏘有力。這樣的組合讓作者不需使用太多學術論證也能令人信服。然而，這個風格上的創造成果實為真正的成就。朱東潤對於其材料的掌握可說游刃有餘，他的論題明確，也打從心裡熱愛他的書寫對象，這一切讓古典與現代這兩種聲音，在他的書中完美地彼此互動交織。他同時也非常明智地採用一種較古老的口語形式，就好像是會出現在明代宮廷的用語，只要書中人物出現對話，一律採取這種語言模式。這種明代的口語是推敲自張居正的備忘錄與日記，在這些文章中，偶爾略帶文言，但基本上保留了對話時的用字。朱東潤精妙的模仿讓他的傳記讀來更帶有一種真實性。

這本書以張居正的先祖張關保與明朝開國之間的微弱關連開場，結尾則談到張居正死後一年遭到抄家削爵的冤屈、在明朝末年的訟冤平反，以及作為張氏一族在明朝走向滅亡之前最後的一位犧牲者，他的孫子張同敞的慷慨赴義。這部作品的主體主要處理張居正作為內閣首輔的十年，他在這段時間中重要性急速攀升，成為支撐帝國的唯一樑柱。以他作為中心，勾勒出一個清晰準確的景象，在這幅景象當中，夾雜在前面半世紀的混亂、暴政與異族入侵，以及後半世紀的快速衰亡之間，帝國安享著十年的穩定、繁榮與平靜。

我們已於前文指出，朱東潤的這部作品必須放置在整個中國傳記文學傳統的脈絡之中方能了解其價值所在。在巨大的「正史」之下，「子傳記」中的個人生命就如同車輪中的齒輪一般微不足道，僅僅只是插入政治潮流與事件之中的註解，在這本「大傳」之中，形勢顛倒而主客易位。主人翁立在那裏，所有的社會與政治機制、系統與規範，就如同是其才能與人格特質的反射鏡像一般出現。相較於作為史學家檔案的刻板文章，這些客觀事件反過頭來取得更豐富的生命力與意義。朱東潤平易近人的敘述，經常是對《明會典》、《明史》諸「志」中的不同部分，或其他禮制規範進行一番詳細而深入的考察研究之後所得到的結果，用以證實與張居正在某個時期的行為有關的一個論點，或是為理解他在特定政治情勢下所採取的策略。

一般因為明代政府的低效運作而對之評價甚低。但其靈活的法律與政治系統所採取的原則仍值得進一步探討。這部傳記的主要關注雖然在透過呈現張居正管理與改革的方式，強調他的人格特質與能力，但我們也可以同時清楚看到國家機器到底如何實際運作。舉例而言，「六部」與「六科」

的重複雙稽核功能、「都御史」的高度權威、文官的權力高過武官，或者是低階言官的重要力量等等制度的利弊都以實際的事件加以討論呈現。以如此生動的方式描述影響各階層人民的社會與政治環境，相信無論是文科生與社會科學生都將同樣深感興趣。這部著作無疑會以其對於現代中國文學創作與歷史研究所產生的巨大貢獻而流傳後世。